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

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研究

——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7）

高中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

丛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

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研究

——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7）

◎ 高中伟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玮
责任校对:罗 丹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研究 / 高中伟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614-5575-3

I. ①新… II. ①高… III. ①社会组织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8142 号

书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研究

——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7)

Xin Zhongguo Chengli Chuqi Chengshi Jiceng Shehui Zuzhi de Chonggou Yanjiu

——Yi Chengdu wei Zhongxin de Kaocha (1949—1957)

著 者 高中伟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575-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1
字 数 37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石 坚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志刚 朱方明 罗志田 段 峰 姜晓萍

项 楚 姚乐野 曹顺庆 黄宗贤 卿希泰

唐 磊 徐玖平 蒋永穆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

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成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而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 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 年 5 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儁（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麀（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 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目 录

丛书序	(i)
绪 论	(1)
一、选题的源起及意义	(1)
二、研究现状透视	(5)
三、时空界限	(12)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14)
五、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17)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发展概况	(21)
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概念界定及类型分析	(21)
第二节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	(24)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及工作目标	(30)
一、单位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主体的全新构建	(31)
二、街居制：基层管理性组织的重新定位	(34)
三、新的身份确认：社会团体的重新界定	(39)
第二章 军事管制到区街建政：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	(45)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的临时军事管制	(45)
一、接管城市与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建立	(45)
二、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建立的基本情况	(49)
三、军管时期城市政权的主要管理工作	(59)
第二节 接管建政：区一级行政体制的形成	(77)
一、对国民政府时期区公所的接管	(78)

二、区公所组织机构的扩大和改革·····	(79)
三、区人民政府的成立·····	(83)
四、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创设与终结·····	(85)
第三节 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	(90)
一、街政府的短暂存在·····	(91)
二、民政干事代行街道管理职能·····	(92)
三、城市街道办事处创立·····	(93)
四、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规范运行·····	(96)
第三章 保甲制到居民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 重构·····	(101)
第一节 民国时期成都地区的保甲制度·····	(102)
一、中国农业时代的保甲制概况·····	(102)
二、保甲制度在民国时期的重建·····	(102)
三、民国时期保甲组织在四川及成都地区的建立和推行·····	(104)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创立的背景分析·····	(110)
一、新政权为有效进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	(110)
二、新政权为有效进行政治动员、树立新政府威信的现实需要·····	(111)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	(114)
一、取代保甲组织·····	(115)
二、新居民委员会组织的草创·····	(121)
三、居民委员会的结束和居民小组的扩大合并与精简整顿·····	(128)
四、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统一与规范·····	(134)
第四节 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与作用分析·····	(141)
一、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分析·····	(141)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作用·····	(149)
第四章 国家力量的渗透与延伸：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治性社会团体的 解构·····	(155)
第一节 封建性政治团体的取缔与改造·····	(155)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封建性政治团体的基本思路 ·····	(155)
二、反动团体：彻底取缔与坚决打击·····	(156)
三、同乡会、同学会等旧团体：促其自行淘汰·····	(163)

第二节 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建构·····	(169)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会组织在城市社会的重建·····	(170)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团体在城市社会的重建·····	(175)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团体在城市社会的重建·····	(178)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的性质和作用分析·····	(18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的性质分析·····	(184)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分析·····	(190)
第五章 从社会救助到政府救助：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公益性社会团体的 重构·····	(197)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救助的必然性分析·····	(197)
一、社会救助与弱势群体·····	(197)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状况·····	(198)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开展城市社会救助的必要性·····	(205)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开展城市社会救助的基本思路·····	(207)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旧有慈善救助团体改造与转型分析·····	(209)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有慈善救助团体的改造与转型·····	(209)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慈善救助团体走向消亡的原因分析·····	(214)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政府救助体系的构建·····	(218)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救助及安置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218)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收容与教养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223)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救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229)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优抚安置体系的构建·····	(237)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政府救助体系的作用分析·····	(243)
一、稳定城市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	(243)
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城市经济·····	(244)
三、破除旧有社会风气，塑造良好风尚·····	(245)
第六章 思想改造与宗教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化与宗教团体的 改造与转型·····	(247)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文化改造的背景分析·····	(247)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思想文化现状分析·····	(247)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改造的必要性·····	(250)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思想文化的基本思路·····	(254)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化团体的改造与转型·····	(260)
一、党和政府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的组织强化·····	(260)
二、文化教育机构的国有化·····	(262)
三、文化民间社团的官方化·····	(273)
第三节 宗教革新与城市宗教团体的改造与转型·····	(28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宗教及宗教团体的现状考察·····	(281)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教政策·····	(286)
三、城市宗教团体的革新改造与转型·····	(290)
结 语·····	(307)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3)

绪 论

一、选题的源起及意义

（一）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①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十七大报告提到了维护“社会稳定”，“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②，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③ 等措施，这些内容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组织的研究逐步兴起，并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比如，社区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有关社区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一些学者呼吁基层群众组织——居民委员会应从行政性属性向社会性属性转化^④；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赋予居民委员会以行政主体的身份，以便其更好地体现城市社会管理微观重心的功用^⑤。如何来解答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笔者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工作者，喜欢追求“原点”，喜欢从历史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时代要求，刚刚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挑

① 本书组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② 本书组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③ 本书组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30页。

④ 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⑤ 这类研究者多为政府官员以及行政研究人员。参见白益华、张孝敢、张永英：《鼓东街道加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情况调查》，载《中国民政》1995年第7期；杨荣：《论北京基层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社会的稳定问题，由于国内外颠覆性势力的存在，加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极为有限，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执政的第一要义。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在城市。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已积累了相当的农村建设经验，但对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却比较陌生，缺乏经验。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中心。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要确保政权的稳定，必须尽快实现城市社会的稳定。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将乡村纳入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轨道，依靠城市领导农村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为此毛泽东早有预见，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即明确宣布“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只有城市经济恢复起来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①。但对于缺乏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海内外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心存怀疑，然而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这些怀疑。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城市之后，不仅迅速地实现了城市社会的稳定，而且得到了城市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呢？这是一个引人思考并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笔者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愈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那样一个极不稳定的城市社会中如何按自己的意志重构城市社会，并最终建立一个被历史证明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城市社会，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很有现实借鉴价值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政权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加强社会控制和实现社会稳定。之后，新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展开了社会调控体系的重构，传统社会中基层社会控制的主体——士阶层和家族宗法组织在城市的基层统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中迅速被瓦解，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向现代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转换。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基层社会重构过程中，主要的方法有：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治理，清除了旧有的不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社会陋习；循序渐进地重构了城市新的政权体系；对基层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使单位制成为城市社会整合的新机制，基层管理组织从保甲制更新到以劳动人民为领导的新的组织——居民委员会，它不仅是对保甲制度的替代，而且还是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改造的组织载体；近代以来在相当程度上操作着基层社会的社会中间组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织逐步被从属于国家的各人民团体所取代，实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一体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城市社会稳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对于新国家的性质有充分的认识，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彻底清除旧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性基础，并在清除旧的社会结构过程中，以城市下层民众为核心重构基层社会，从而构建新政权自己的社会结构与人民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基层社会组织的方法，对我们今天城市基层社会的和谐建设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笔者所在的城市成都 2007 年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学者的关注。建设和谐成都，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建设无疑十分重要，并且成都已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给今天成都的发展提供一点历史的参考，本书以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为理论描述框架，选取 1949—1957 年的成都为时空范围，描述成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社会组织的全面重建，总结社会调控体系重构过程中我们党的经验与教训，以期能对今天有所启示。

（二）学术研究的需要

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社会史研究，尤其是有关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是当前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史、城市史研究在我国勃然兴起，但是社会史偏重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等方面的研究，城市史偏重于近代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而且研究的时间段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社会史特别是城市社会史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标志之一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高潮迭起。1986 年 10 月，由《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牵头召开了世界社会史研讨会，拉开了新时期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大幕。此后成立了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史学会。各种社会史的著作、资料 and 论文数不胜数。高等院校开设了社会史课程，设立了以社会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旺，改变了史学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从中外史学研究运行轨迹考察，“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社会史，这几乎是中外史学研究顺理成章的共同走向”^①。像大千世界任何事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一样，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其最大缺陷是，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当代社会史，而且没有一部

^① 李华兴：《方兴未艾，任重道远》，载《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包括当代社会史的中国社会通史。就连影响较大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也只是叙述了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古代社会史，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社会史，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社会史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需要强调的是：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化解矛盾、消除冲突、解决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平稳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史，是在中华文明史上需要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篇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①全面系统地考察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来探索和深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六大以来三个时期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用翔实的史料复原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积极主动地正视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就是一部完整的当代社会史。因此，无论是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来审视，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最新要求来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须填补的学术空白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田居俭专门撰文呼吁：“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②。笔者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期能够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尽绵薄之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呼唤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强城市史研究，为城市的现实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智力支持。城市史学在我国学术界兴起，日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国外相比，国内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备受政府和学术界重视，发展堪称迅猛。有关城市史的研究，在国家和地方的科研立项中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七五”期间，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大城市的近代发展史就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此后从“八五”一直到“十一五”的国家社科基金都有城市史的项目中标。至于地方各级政府、高校相关的立项则为数更多。众多的科研立项使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相关学术论著层出不穷，学术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在城市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四川大学的隗瀛涛、何一民教授始终走在

①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版。

② 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7年第12期，第148页。

研究的前沿，并于1988年创立了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现为城市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牵头出版了《城市史研究》专刊，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城市史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单体个别开放城市到形成一般性城市的普遍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过程；实现了从单一实证分析或理论探讨到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突破；形成了由历史学的单一研究过渡到结合地理、经济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态势；表现出一般事实的分析向以事实为基础的多角度综合分析转化的特点等。然而综观城市史研究，笔者发现：从时间段上来看，当前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近代，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力度和深度都还显不足；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为研究主线，对城市社会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社会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近年来城市社会史研究也逐步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一民教授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对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①，一些学者对城市下层社会中人力车夫、乞丐、娼妓等群体的研究成果颇为关注，还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基层社会组织的构建。但是总体上看，对当代城市基层社会尚缺乏系统的考察、梳理与整合，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成都这个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基层社会调控问题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强新中国初期成都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问题的研究，可起到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可以推动当代城市社会史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城市史学的研究领域。

二、研究现状透视

城市史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为主要目的的历史学科，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建筑学等许多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包括城市背景中发生的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如城市化过程，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体系、结构与功能的演变及城市设施，居民生活，礼仪风俗的变迁等。城市史的研究，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首先在城市化发育成熟的美国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对中国城市史有了一些研究，但由于中西文化的长期阻隔，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成果了解不深入，不全面。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已出版了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论著，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

^① 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04年。

近代城市史研究已经形成若干理论模式，并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施坚雅的集市体系和区域体系学说，罗兹曼的中国城市网络学说。他们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是将区域学说引入中国城市史研究，注意到了中国区域间城市化差异这一重要特征，突出对城市网络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结构的现代化问题。施坚雅等人的研究背景是西方史学界对马克斯·韦伯“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和“东方主义”的兴起，所以其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学者在逐步了解这些理论后发现，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中国国情相悖的一面。此后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年），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杨格的《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关满屯的《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史明正的《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约翰逊·L. C. 的《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日本学者高桥孝助等的《上海史——巨大都市形成与人们的经营》（东方书店，1995年），都很有特色。区域性的城市史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如卡蒂尔·C. L. 的《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林达·约翰逊主编的《中国帝制晚期的江南城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丰富了西方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此外，施坚雅等人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汇集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众多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的成果，足以显示西方学者的研究实力。日本学者对中国城市史也有精细的研究，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今掘诚二就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今掘诚二不是从权力一方来把握城市史，也不是从革命运动的政治斗争立场来分析城市史，而是始终以人们的日常世界作为研讨对象来研究北平市民的“水会”，试图描绘出当时的北平社会，这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实证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史研究会成立，从此日本学界试图通过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来回答“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从某一种角度上讲，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加微观和具有实证性，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模式有极大的方法论价值。从国外学